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重塑智能化时代军事常识观

■表艺

军事常识是军事知识体系中军人必须掌握的最小知识库。它不仅吸收了以往战争经验和传统作战理论的精华，还浓缩了现代军事科技及其应用成果的新知，是军人高效从事战略决策、作战指挥、装备操作等一切军事活动的知识基座。智能化时代知识爆炸、深度伪造、大语言模型幻觉等现象的出现，持续冲击着传统的军事常识观，对军人吸纳常识、运用常识、超越常识构成新的挑战。这就要求现代军人准确把握军事常识新变化，淘汰更新旧常识，提炼用好新常识，形成符合智能化时代要求的军事常识观。

拥抱新知：动态扩充军事常识体系

当今时代，新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持续涌现，人类知识总量几年内就会翻一番。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近30年来人类积累的知识总量占历史知识总量的90%。“大规模参数深度神经网络+海量多模态数据预训练”的生成式大模型可大批量持续生产新知识，更是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一个人一生能够掌握的知识，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占比将越来越小。

及时吸纳常识。军事领域作为现代科技创新与应用的最活跃领域，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群冲击下，新质武器装备、新型作战力量、新的作战概念等层出不穷，军事知识的生产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作为军人知识体系中最常用、最实用和最必要的部分，跟上时代要求及时将核心知识固化为常识，动态扩充军事常识体系变得越来越重要。

借“智”掌握常识。人工智能系统可辅助人快速获取专业知识，已成为智能化时代的新常识。善于运用这一常识来扩大自身常识体系的人，在面对与人工智能的竞争时，更容易占据主动。目前，部分大语言模型已经学完了互联网上几乎人类所有的知识，是一个可随时调用的常识库。军事大

要点提示

- 智能化时代，更需辩证看待军事常识体系的“破”与“立”，既要通过知识常态更新保持认知的前瞻性，又要避免过于信赖现有常识造成的认知盲区、决策雷区和行动误区
●广泛筛选新知、科学验证核实、固化形成常识、善于突破常识，构成了智能化时代军事常识生成与运用的基本规则

模型将成为军人扩充现代军事常识的利器。

剔除过时常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常识也会过时，失去其正确性，必须从常识体系中剔除出去。例如，照片、视频等是对真实世界的客观记录，这以前是正确的常识，但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可生成几可乱真的假图片、假视频，“眼见为实”就成了过时和需要淘汰的常识。

择善而从：精准筛选新的军事常识

智能化时代，人脑容量有限性与知识增长无限性的矛盾，人类学习速度跟不上知识增长速度的矛盾更加突出，尤其是人长期处于繁重的作战活动中，受时间精力所限，在掌握军事知识方面难以走出“知识过载”困境。在智能化时代，善于学习比勤于学习更为可取，精选知识比掌握知识更为紧迫。

提炼新的常识。不同军事知识价值密度差异显著，需要练就“知识蒸馏术”，将知识区分为需要精通的、熟悉的、涉猎的和可忽略的4个层次，提炼其中对军事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普遍性、基础性、实用性和科学性知识，并固化为军事常识。

避免错误常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海洋中也漂浮着不少真假难辨、以假乱真的垃圾知识。应注意甄别并剔除敌对势力抛出的欺骗性知识、网络媒体的碎片化知识、伪专家宣扬的误导性知识、生成式大模型幻觉产生的假知识等，避免将其纳入常识体系中。

破除定式：避免军事常识信赖陷阱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是打破规则、超越常识，最喜欢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域。军事常识既锚定着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可能成为禁锢作战创新思维的“枷锁”。智能化时代，更需辩证看待军事常识体系的“破”与“立”，既要通过知识常态更新保持认知的前瞻性，又要避免过于信赖现有常识造成的认知盲区、决策雷区和行动误区。

正确运用常识。过于信赖常识往往会导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使军人无法灵活地应对战场变化，甚至导致失败。二战时，法军固守于二战形成的堑壕战常识，忽视了战争形态演变与德军战法创新，导致苦心经营的马其诺防线沦为摆设。每名军人都应清醒地认识到常识的局限性和相对稳定性，把握其前提条件、运用时机和适用范围，科学地运用常识。

开展反常识训练。高频次运用常识且不出问题，可能会产生思维惰性，并因无法突破常识而受其禁锢。需要善用批判性思维，开展经常性的反常识训练，建立“常识批判性验证机制”，通过演习演练、兵棋推演等预实践，有意识地主动暴露可能被敌利用的常识陷阱。适度推行“反常识压力测试”，强制指挥员在日常训练中打破一定比例的

既有规则实施组织指挥。

提升技术理解力。智能化时代新增的军事常识大多是技术类常识。正如“1+1=2”在普通人眼中是不证自明的常识，但在数学家眼中就不是常识一样，对于新军事常识始终要从技术原理层面上进行分析把握，看穿这些常识中可能被敌利用的技术漏洞。

出奇制胜：反向利用军事常识创新战法

以正合，以奇胜。军事常识演进本质上“是经验固化”与“创新突破”的永恒博弈。广泛筛选新知、科学验证核实、固化形成常识、善于突破常识，构成了智能化时代军事常识生成与运用的基本规则。唯有如此，才能在未来复杂的战场环境中实现“以常识守正，以反常识出奇”的制胜目标。

打破常识创新战法。战争中善于利用对方对常识的固化认识施计用谋，往往能够占据主动、夺取优势。韩信背水一战打破了“死地不能用兵”的常识；德军高射炮反射坦克打破了“高射炮是防空兵器”的常识；刘伯承七亘村三次设伏打破了“战胜不复”的常识；朱可夫命令坦克部队打开大灯大摇大摆通过德军守卫的大桥，打破了“敌人不敢直接通过己方防御区”的常识；智能化战争中，有更多的常识等待去打破，从而创造出更多出其不意的战法。

创造新常识创新战法。在科学领域，质疑、反思并超越原有常识产生的新常识，往往是划时代创新和颠覆性突破，“日心说”超越“地心说”就是典型案例。在军事领域，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创造新常识的一方，将可能拥有对敌降维打击的优势和重新定义战争的权力。在近几次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智能化情报分析系统可预测敌未来行动、四旋翼无人机成为坦克杀手、低轨星座可保障支援战术行动等一系列新常识，正在强力改写战争面貌。

智能化战争面面观 49

群策集

●军事创新的关键，在于先进技术能否与战场需求、作战体系深度融合

据外媒消息，美国陆军第七训练司令部最近在德国格拉芬沃尔军事基地进行了一项测试，用小型无人机投掷M67手雷实弹。美军宣称，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展示从小型无人机上投下实弹手雷的情况”。然而，该测试视频发布仅几分钟，就遭到全球网民群嘲，因为“无人机扔手雷”早在2016年就已实现，美军花费3年多时间研发的“先进武器”，一问世便落伍了。

这个“领先变落后”的乌龙，实际上印证了军事创新的一个内在规律——在战争形态日新月异今天，军事创新必须坚持开放、敏捷和超前，方能引领军事变革，创造出真正领先的军事技术。军事史上，貌似“先进”实则落后的武器装备及技术屡见不鲜。一战前，德国工程师研发的硬式飞艇，凭借其巨大体积和氢气浮力，一时成为战略轰炸工具，但却存在航速慢、升限低、氢气遇燃烧弹极易起火等“先天不足”。一战初，德军利用改进型飞艇对英国本土发动袭击，但随着英军战斗机和防空技战术的改进，德军飞艇损失率激增，只好退出战争舞台。无独有偶，一战后，英军推出装备有8门381毫米主炮的复仇级战列舰，主装甲厚度达330毫米，但其水平装甲仅25~76毫米，整体防护能力明显不足，加上防潜网存在漏洞等因素，轻易被德军U型潜艇用鱼雷击沉。

历史一再证明，军事创新不能一厢情愿、闭门造车，不能只知低头走路、不知登高望远，更不能只求技术先进、不顾实战需要。要想在创新上有所突破，必须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和军事变革的最前沿，以超前思维、开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洞察世界最新科技发展特别是军事技术发展状况，了解掌握各种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尤其是新武器、新装备和新战法。真正的军事创新，不是某项技术“单点突破”，而是技术、战术、组织机制的“体系重构”。二战期间，雷达与无线电技术的成熟虽为盟军带来战场优势，但直至其将护航制度、空战战术、情报共享结合，形成多维度反潜网络，才最终击败德军的“狼群战术”；海湾战争中，当F-117隐身战机、E-3预警机、精确制导导弹形成组合效应，将信息优势转化为体系优势，才改变了传统的空地对抗模式，获得了战场主导权。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道理：军事创新的关键，在于先进技术能否与战场需求、作战体系深度融合。

其实，军事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军事技术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源于实战需求。军事创新的真正意义是解决战争实际问题，而非追求形式上的“首次”和“领先”；其终极目标是“适应实战需要”，而非“证明技术先进”。

■胡建新

军事创新须杜绝「闭门造车」

军事竞争不但是技术的比拼，更是思维的较量，谁能更快确立新理念，吸收新技术、适应新战场，谁就能获得真正的优势和主动。

军事创新最危险的倾向在于，用“首次”标签掩盖对未来战场的漠视，用“领先”幻觉逃避对作战需求的深思。适应实战的创新不是“我要领先技术”，而是“我要打赢战争”；不但是“我能发明什么技术”，更是“我能创立什么战术”，只有让军事创新扎根于战场需求，让“首次”服务于“有效”，让“领先”回归于“制胜”，才能推动军事变革真正取得成功。这就需要跳出“井蛙视野”，杜绝“闭门造车”，以全新视角审视战争，以超前思维寻找最新科技成果与军事需求的最佳结合点，研发具有实战价值的先进技术，创造新的战争理论和作战方法，从而抢占世界军事变革的制高点，掌握未来战争主动权。

掌握分敌制胜之道

■何冠呈

挑灯看剑

《三十六计·围魏救赵》有云：“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意思是说攻敌集中，不如击敌分散；攻敌正面坚固，不如击敌侧面薄弱。自古以来，重视分敌、善于分敌，一直是赢得战场主动权，进而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方法。现代战争中，作战环境、力量、样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分敌”的思想一以贯之，但是“分敌”的重点和手段却已今非昔比。应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分敌制胜的新内涵、新特点、新要求，掌握现代战争的分敌制胜之道。

夺敌意志以分敌。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回望历史长河，我军之所以能够屡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制胜奇迹，很重要的就是拥有敢战能战的意志品质。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加速演进，战场环境更加复杂，作战手段更加多样，战斗转换更加频繁，在短兵相接的“钢铁”碰撞和科技对垒的“智能”比拼背后，敌我双方的意志较量极大地影响着胜负走向。夺敌意志以分敌，就是要瓦解敌人战斗意志，削弱其作战的组织性、主动性、预见性，从而为分割、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各级指挥员要让政治工作威力在未来战争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引导官兵从法理、道义、历史、现实等多角度看清斗争本质，树牢正义必胜的价值取向，确保在直面强敌时敢战能战，在长敌彼消中动摇敌意志、削弱敌精神。

破敌体系以分敌。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现代战争作为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体系内部各种作战力量的统一行动、互相融合对赢得战争至关重要。只有站在全局谋划部署破敌之策，集中优势力量打破敌各级指挥机构和作战力量之间的纵向、横向协同，对维系作战行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关键指控节点进行精准破坏，才能达到牵敌一“发”而动其“全身”的目的，进而实现分敌制胜。作为指挥员，要善于区分目标在敌体系中的价值，精准评估确定打击手段、打击方式、打击时机和毁伤部位，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信息通信类、指挥控制类等不同功能目标，一人一策、一物一策制定打击方案。

瓦解阵营以分敌。无论是在传统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中，如果无法同时消灭所有对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敌对阵营中的各方矛盾割裂和利害冲突分化对手，使其不能形成合力，为打击敌人创造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就非常善于从利害着眼，像庖丁解牛一样把貌似强大的敌人阵营，准确地解剖开来，分为若干类型、若干层次、若干性质，从而抓住时机，逐一歼之。战争年代，我党我军正是充分利用了敌对势力各方之间的矛盾和企图，成功分化敌军，陷敌于孤立无援之地，最大限度削弱敌军战斗力。

抗日根据地统筹战建备工作的启示

■薛原 潘志辉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施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当下，深入研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做好战争统筹、建设统筹、备战统筹，增强国家战略韧性、高效应对战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争统筹：军地结合与战术创新。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多助。这4个特点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想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坚持群众路线与人民战争。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形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1937年11月，聂荣臻同志带领部队从山西五台开赴冀西阜平，创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是我军在敌后创建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即《双十纲领》）颁布，使根据地群众参军热情高涨。面对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残酷的“扫荡”“蚕食”，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同时，抗日根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和民兵相结合，深入敌后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聂荣臻同志曾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厚兵源。”其次，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

战术。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八路军发明“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非对称战术。华北沁源反“扫荡”战斗中，太岳军区组织八路军和民兵、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集团，展开群众性的伏击战、夜袭战等游击战术，创造性地使用地雷、滚雷、水雷、草雷、踏拉雷、空炸雷，从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进行了270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400多人。在地道战方面，1944年冀中“完成后之地道”，可能已达二万五千里，已经发展成家家互通、密如蛛网的地下网络，“重新创造了一层地下的抗日根据地”。再次，坚持军民协同提升战斗力。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主力军一地方军一民兵”三级协同体系。主力军承担机动作战，地方军负责区域防御，民兵则承担袭扰、情报传递等任务。此外，根据地士兵农闲时训练、农忙时助耕，农民为部队提供粮食、布匹，这种互利模式使军粮储备快速增长。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借鉴抗日战争时期军地结合与战略创新的成功经验，建设高效的国防动员体系。比如，可以利用民用无人机等加装定位模块等技术执行边境巡逻、灾害救援任务；进行预备役改革，将一些新领域从业人员纳入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区块链技术应用，努力将军队物资需求、民用工厂产能、物流数据上链，实现实时匹配。

建设统筹：经济斗争与机制创新。面对日军的封锁和“扫荡”，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一系列创新性政策和实践，有效提高了战争自持力。一方面，坚持自给自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开荒产粮，同时推动商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全面发展，1944年粮食产量达到175万石，比1937年

增加38.9%。359旅在“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口号鼓舞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3年奋战把“烂泥湾”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敌人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另一方面，坚持兵工自造。八路军总部在山西黎城建立黄崖洞兵工厂，采用分散隐蔽的方式，将重要车间布设在多个天然岩洞中、宿舍、厂房、仓库一应俱全，很快就发展成为八路军在抗日根据地规模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抗战期间，黄崖洞兵工厂累计生产手榴弹58万枚、迫击炮2500门、炮弹26万发、“八一式”马步枪1万支，有力保障了前线部队作战。在新四军，彭雪枫设计弧形马刀，该刀刀身细长、刀背轻薄、锋利便捷，比当时的日本军刀要长5厘米，在实战中展现出强大战斗力。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对经济韧性与产业链安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继承和弘扬抗日战争期间我党我军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优良作风，坚持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要强化平战结合、战建统筹，调整优化国防工业、战略资源等产业布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保障韧性，提高其在极端情况下的运行能力、被毁情况下的快速修复能力，依托我产业链完备、大物流等优势，确保战争支撑体系和作战体系顺畅运行。

备战统筹：危机应对与韧性构建。抗日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环境

和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我抗战军民利用作战间隙，想方设法提高备战质效，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首先，动员群众，构建多层次情报体系。抗战期间，华北根据地人民群众发明了“消息树”和“鸡毛信”来传递情报。在延安，八路军技术人员就地取材，组织收集群众的收音机、手电筒里的干电池，把社梨木作为绝缘材料，造出属于八路军自己的电台，火速送往抗战前线，保障了战场必要的通信网络。其次，大抓民兵训练，巩固后备力量。根据地要求民兵具备射击、埋雷、侦察、救护等多种能力，各县大队、区小队通过射击训练和战场实战不断积累经验，逐步编入主力部队。再次，做好后勤保障，夯实物资储备。东北抗联在长白山修建密营，存粮食、药品和弹药。他们将粮食装入陶罐，埋于冻土层下。药品则用油纸包裹，藏于树洞或岩缝，有力保障了战斗所需。这些启示我们，在危机应对和国防动员等方面要建立高危一体的跨部门联动体系，建立快速动员、梯次动员、全面动员的应急响应机制，细化完善重大事变、突发情况、极端状态，实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全局整合、有序运行和高效释放。

